

明清江西宗族的儒家文化传承与乡村社会秩序

施由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明清江西宗族传承着儒家文化,表现在:修谱将儒家文化具体化为族人学习和遵守的文本、族规和祠规将儒家文化具体化为族人的行为规范、祭祖让族人感受和树立儒家的文化信仰、宗族教育将儒家文化化作族人的内在文化修养和个人价值追求。明清宗族的儒家文化传承对明清两代600多年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铸就了基层国民孝悌、仁义、友善、和睦、勤劳、守法、端正等的根与魂。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关键词】明清;江西;儒家文化;社会秩序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4-0129-08

On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Rural Social Order in Jiangxi Province

SHI You-m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cademy,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330006)

Abstract: Dirom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clans inherit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mpiling genealogy concretely translates Confucian culture into the text; clan rules and ancestral rules concretely transforming Confucian culture into the behavioral norms of the clans, by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make people feel and establish Confucian cultural beliefs; clan education turns Confucian culture into their inner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and personal value pursuit. This inherita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ord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 more than 600 years, mainly manifested that Confucian culture cultivate the grass-roots people's better moral character such as filial piety,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friendliness, harmony, diligence, law-abiding and behavior dignity. In today's modernization course,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must get rid of its dross, extract its essence,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xi; Confucian culture; social order

宗族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近百年来国内外有许多重要成果,如对于中国宗族的历史演变、宗族与地域社会的治理、宗族与古代及近代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等,都有许多研究成果。^①关于明清宗族的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香港学者科大卫《明清社会与礼

【收稿日期】 2019-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19BZS136)

【作者简介】 施由明(196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江西地方史。

① 可参见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常建华《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关于江西宗族的研究可参见施由明《明代江西宗族的发展》(《中国农史》2013年第2期)。

仪》^①认为16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核心是宗族与礼仪,是宗族的礼仪建设使社会有序化。毫无疑问,礼仪建设对规范人和塑造人去遵守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然而,礼仪仅仅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明清宗族的文化遗产有着更多深刻的思想内容,对塑造人去遵守社会秩序有着更关键的作用。本文以江西为主要考察对象,试着对明清中国宗族的文化遗产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作些探讨。

一、明清江西宗族传承儒家文化

中国宗族走过了周代宗法制宗族、汉代豪族制宗族、魏晋隋唐门阀士族制宗族,再到宋元明清至近现代庶民宗族的历程。江西的庶民宗族孕育于唐代中后期至唐末五代的北方人口南迁,在庶民宗族孕育之初,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宗族就非常重视宗族的文化建设,他们创办宗族书院以培养宗族子弟的文化素养及培养科举人才,如高安幸氏桂岩书院、德安陈氏东佳书堂、奉新胡氏华林书院、新建陈氏飞麟学塾等都是宗族所办。但唐五代的这些宗族后来都分解了。江西庶民宗族的真正形成是在南宋时期,其标志是南宋时期江西的文人文集中出现了较多的“族谱序”,意味着庶民宗族在南宋时期进入了自觉的宗族建设阶段,他们通过修谱凝聚族人。到元代则出现了更多的“族谱序”,标志着庶民宗族更普遍地形成。

因宋元时期的族谱已不存,无法从族谱内容去研究宋元时期庶民宗族起步时的状态,但现存的“族谱序”中反映了宋元时期庶民宗族建设的一些状况。从宋元时期江西文人的“族谱序”可知,在庶民宗族进入自觉建设之初,所用于凝聚族人的是儒家思想文化,如尊崇祖先、遵守长幼间的人伦关系和礼仪、以祖先的光辉业绩和奋发向上的人格为典范等。中国庶民族谱的开山之作——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中说明其撰写目的:“某不幸幼孤,不得备闻祖考之遗德,然传于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吾先君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获承其一二矣。”又说:“使谱牒互见亲疏,有伦宜。”^②

欧阳修(1007-1072)所说用于宗族建设的忠、孝、廉、学、亲疏、伦宜,都是儒家的思想文化。自欧阳修之后,庶民宗族的建设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些儒家的思想文化,以尊祖敬宗为核心,以明亲疏、厚人伦等为媒介,达到凝聚族人和族人团结有序的目的。如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苏洵(1009-1066),在欧阳修之后撰写了《苏氏族谱》,其目的是凝聚宗族,族人不至于相见如途人,使族人能保持孝悌之心,“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③

欧、苏之后,北宋的理学家张载(1020-1078)、程颐(1033-1107),为庶民宗族的建设创设理论基础,并提出庶民宗族建家庙和祭祖来凝聚宗族的设想。

张载在《张子全书·宗法》中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④张载主张将上古的宗法制普遍化、民间化,普遍建立各自的统系,使人人知“来处”,并在理论上提出了立家谱的必要,开了宋代主张立家谱的理论先河,对后来家谱的普及与兴盛起了重要作用。张载还主张不分贵族官僚和庶人都建家庙祭祖:“凡人正厅,似所谓庙也,犹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于此行之。厅后谓之寝,又有适寝,是下室,所居之室也。”并且主张“庶人亦须祭及三代”,“士大夫有大事”可以“裕及其高祖”,即祭及四代祖先。^⑤

① 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 欧阳修:《文忠集》卷71《序·欧阳氏谱图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2册,第56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下同)。

③ 苏洵:《嘉祐集》卷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947页。

④ 张载:《张子全书·宗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7册,第129页。

⑤ [宋]张载:《张子全书》卷8《祭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7册,第182页。

程颐比张载更明确地提出,士大夫和庶人都可以建家庙,且士大夫可以祭祀始祖和先祖。程颐说:“收合人心,无如宗庙。……系人心,合离散之道,无大于此。”^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先祖者,向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设二位。常祭止于高祖而下。”^②

张载和程颐的宗法理论与建设构想,对此后的庶民宗族的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南宋朱熹(1130—1200)继承和发展了张载和程颐的思想,构建了“家礼”理论,创设了祠堂祭祖的办法来凝聚宗族,为庶民宗族的发展架构了模式。

明清时期庶民宗族的体制逐渐发展得相当完备,并传承着宋儒们提出的用儒家思想文化凝聚与建设宗族的传统,且进一步将儒家文化贯彻到基层族人(即基层民众)中,明清江西宗族建设具有代表意义,反映了明清宗族传承儒家文化的特点。

一是修谱将儒家文化具体化为族人学习和遵守的文本。修谱是宗族建设最主要的内容,是凝聚族人最基本的手段,是庶民宗族弘传儒家文化最好的方式,明代江西文人在理论上有很多深刻的论述。明代江西理学家罗钦顺(泰和人)在《雷冈康氏族谱序》中说:“谱牒不修,则本源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穆之风鲜不微矣。前代虽有显者,其亦不复接于耳目,又安知践修之责之在于我,求其能免于卑陋而聿进于高明,岂不难哉。故善观人之家族者,即其谱牒之废举,而其昌大与否亦自可见。”^③又说:“仁让之行、诗书之业,此谱之所系未可轻视也。故凡有志于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尝不以谱牒为重。”^④即罗钦顺认为,明本源、辨昭穆、弘仁孝、行礼让、兴诗书、大家族,全在于族谱是否修撰;从族谱废举,还可看出一个家族昌大与否!明代江西文人李时勉(安福人)在《南冈李氏族谱序》中说:“谱者记先世所自出与夫长幼、尊卑、远近、亲疏之序,所以明昭穆而著彝伦之道也!”^⑤即族谱通过明世系,可以让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人伦理论。

从明代的族谱体例可知,明代族谱围绕弘传儒家文化而作,罗钦顺在《曲山萧氏族谱序》中说:“惟于谱后别为事迹志,具载族人之显者本末及所得累朝诰敕,至于祠宇、祭田有关萧氏世德者,皆附录焉。”^⑥在《南安林氏重修族谱序》中谈到该谱的体例:“首姓原,次世系图,又次世传,以及衣冠图,恩命录之类,凡十类,为一卷。”^⑦即通过记载族姓的来源、族人传承谱系、先人事迹、仕宦荣耀,朝廷表彰文献等,教育、启迪后人,成为明代庶民宗族族谱的一大特点。

清代的江西,修谱成了宗族活动的普遍行为,形成了“村村有谱”、“祠必有谱”的状态,如同治十二年《赣县志》卷8《地理志·风俗》记载:“其乡聚族而居,必建宗祠,置祭山,修族谱,以尊祖睦族,长幼亲疏秩然不乱。”^⑧

清代中国族谱体例最为完备,成为了宗族的百科全书,几乎将宗族的所有事都记录下来了,“包括谱序、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五服图、家礼、仕宦记、传记、行状、志录、寿文、贺序、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年表、余庆录、领谱序号等三十余项。”^⑨这些项目和内容,围绕着弘传儒家的伦理文化而展开,所谓“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又所谓“谱之为义大矣哉!将以叙彝伦、立礼义也。不信则不善,不善则传良可惜耳?故君子之为谱也,别庶姓以示信,

① [宋]程颐:《伊川易传》卷4《周易下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册,第428页。

② [宋]朱熹编:《二程遗书》卷18《刘元承手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8册,第241页。

③ [明]罗钦顺:《整庵存稿》卷9《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127页。

④ [明]罗钦顺:《整庵存稿》卷9《龙陂谢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121页。

⑤ [明]李时勉:《古廉文集》卷4《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723、730页。

⑥ [明]罗钦顺:《整庵存稿》卷9《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119页。

⑦ [明]罗钦顺:《整庵存稿》卷9《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120页。

⑧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0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253页。

⑨ 欧阳宗书:《中国家谱》,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尊祖考以示善。盖祖考尊则礼义可以立,庶姓别则彝伦可以叙也。”^①

清代江西谱学的发达还表现在出现了许多族谱的亚种,如墓谱、牌谱、胙谱、婚谱、联谱等。但不管是族谱还是族谱亚种,都围绕着儒家的尊祖敬宗、叙人伦、表礼义、示信善等展开,即族谱就是儒家文化的生活化、具体化的文本。

二是族规和祠规将儒家文化具体化为族人的行为规范。明代的族规以明前期朱元璋所颁《圣谕六言》为基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推行乡约的过程中一些宗族围绕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制定了族规。清代的族规则以顺康熙三帝的“圣训”为依据,宗族将朝廷的乡村治理思想,作为宗族制定族规的指导思想,将皇帝的“圣训”更具体化、通俗化。而顺康熙三帝的乡村治理“圣训”是由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演化而来,如顺治九年颁行《六谕卧碑文》曰:“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②基本上与朱元璋的《圣谕六言》相同;康熙皇帝进一步演绎《圣谕六言》,在康熙九年颁行了《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③到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将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④,演绎成了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

实际上,明清皇帝治理乡村和要求乡民们遵守的“圣谕”“圣训”等,都是儒家文化的要求,宗族的族规更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以乾隆四十五年的《万载辛氏族谱》^⑤为例,其族规包括的内容有:敦孝悌、端心术、积阴德、存心向善、重读书、勤职业、尚节俭、完国课、严赌博、谨交游、慎婚嫁、周族谊、息争讼,共十三项内容,每项内容都有具体的阐释。实际上,这些族规虽然是皇帝“圣训”的要求,也都是儒家文化的传承。

三是祭祖让族人感受和树立儒家的文化信仰。祭祖,这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习俗,人们通过一定的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和已逝亲人的怀念。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祭祀鬼神的习俗,因为人们认为人死灵魂不灭,通过祭祀鬼神,以祈求祖宗保佑子孙平安和带来好运。到了周代,形成了宗庙祭祖,祭祖不仅是为了祈求祖宗保佑,还是一种权力的宣示,因为只有代表国家的天子及分封各地的诸侯们才有权力祭祀祖先。

中国的祭祖习俗,经历了从周代的宗庙祭祖、汉代的墓祠和家庙祭祖、唐代的家庙祭祖、宋代的墓祠和家庙祭祖、元明清时期的祠堂和墓地祭祖的历程。也即经历了从特权到普通人都享有的权利的历程。

明清时期的祠堂祭祖按照南宋朱熹《家礼》卷5《祭礼》设定的“四时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墓祭”的礼仪进行。至于清明的墓祭,以挂纸为主,各地有不同风俗。

祭祖既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也祈求祖先福佑。祭祖的过程实际上是感受和树立儒家文化信仰的过程。因为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要树立人伦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祭祖正是强化这种理念,强化共同祖先的理念,强化族人们共同血缘关系的认同及遵守长幼秩序的认同,从而达到自觉遵守人伦秩序。

四是宗族教育将儒家文化化作族人的内在文化修养和个人价值追求。宗族重学办学,这是从庶民宗族形成之初就已有的传统,办私塾、办书院、兴藏书等。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江西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得益于江西宗族的兴学办学。明清时期江西的宗族传承着唐宋以来的传统,特别重视兴学办学,大多数的家族或宗族都办有私塾或书院,所谓“延师课子”。有的家族或宗族即使不“延师课子”,族中有文

① 嘉庆十四年《重桂堂易氏宗谱》,“十二世裔孙邑庠生秀卿”撰《序》,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2册,第451页。

③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6《圣治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第215页。

④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9《法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第137页。。

⑤ 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化的族人或乡绅也会亲自授学,如光绪二十三年刊印的《清江杨氏五修族谱》^①中的《质庵先生传》记载了这样一位低层乡绅在基层社会的生活:

质庵先生,余从堂兄也,讳兆基,字玉书,生而颖异,髫年承太父命,习举子业,……及棘闱屡试,壮志弗伸,……家居授徒族中子姓,沐其教者不下数十人,而循循善诱,鞭朴不施,约束自严;子姓视之亦无异慈父母,迄今成名者众,大半出其门下,此成就后学,遗泽孔长也。

在明清文人文集、地方志、族谱中,记载了大量这类科举失败,居家为师,教授族人子弟的例子。无论是私塾或书院等族学,或族人授学,所传授的都是儒家文化,所谓“使之习知孝悌忠信之义,以为敦宗睦族计”。^②

明清时期朝廷用科举取士引领儒学的传承,地方官员通过办府州县儒学主导儒学的传承,宗族积极办学、捐学和培养科举人才,使得明清时期儒家文化稳稳地占据了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有诸多的记载: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3《风俗》记载明代的南昌府:“科第未尝乏人,其居肆殖货及挟艺通术之流争尚清雅,植菊兰竹石、收古琴名画、崇儒好俗,至于闾阎村落细民,皆勤於稼穡,敏於役作,秉尊上孝弟之心。”^③即明代南昌区域,人们通过追求科举功名,形成了尊崇儒学、尚雅、勤劳、孝悌的心性。同治《赣州府志》卷20《风俗》记载:“隋唐疆圉日辟,声教浸远,人皆抗节笃志。风俗笃厚而纯一,士知向学,人颇迁善。”^④即文教的发展,使这一区域的人们有节义、纯厚、向学、向善、志向坚定等。光绪《吉安府志》卷1《地理·风土》中记述古代和近代庐陵的读书、重学之风:“吉安府由六一公之乡里,家有诗书,以数万户之井廛,人多儒雅,此州之君子皆颜鲁公之流风遗俗也。”“家有诗书,塾序相望。”“虽极贫苦者皆知教子孙读书。”“俗喜诗书而尊儒雅,不独世业之家延师教子,虽闾阎之陋,山谷之穷,序塾相望,弦诵之声相闻。”^⑤通过读诗书,强化了儒学的内在修养和个人的价值追求。光绪二年《抚州府志》卷12《风俗》记载抚州:“抚之邑属非特地大人庶,冠冕一路而文物盛多亦异他郡。”“临川风俗淳厚,务农者多而最朴,士则惟知读书,所造浅深不同,莫不各有不自得之趣,其中或溺於科举词章之弊者,渐染使然,有志之士固往往卓然自拔於流俗之外,不以为难,其次亦激而厉之,渐以进於古,岂不视乎其人与风俗之徵恶,士习为先,端言谨行,士固知所自爱矣!”^⑥即科举功名是抚州这一地域人们的追求,从而地域风俗淳厚。

除兴学办学之外,那些深居基层的乡绅们对宗族子弟潜移默化的教育也非常重要,由于他们从小是由儒家文化教育和塑造出来的文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儒家的立身处世原则,他们不但在基层践行与传承着正统的儒家文化,还以个人的人格为典范为榜样,传承着儒家文化,在明清时人的文集、族谱和地方志中记载有大量这样的人物。因此,正是宗族教育将儒家文化化作族人的内在文化修养和个人价值追求。

二、儒家文化传承对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

地域社会秩序的稳定,首先是要有让地域社会中人能生存下去的生存条件,然后是法律的维持和地方官员的有效治理。文化传承像无形的手,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重要引领作用。

明清两代600多年,总的来说,稳定的时间多,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既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也

① [清]杨式占、杨能济等修纂:《清江杨氏五修族谱》,江西省图书馆藏,存7册。

②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4《序·石濂曾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728页。

③ 《日本藏中国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年,1990年,第70页。

④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0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60年,第416页。

⑤ 光绪《吉安府志》卷1《地理·风土》,《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71号》,第88页。

⑥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53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第211页。

因为从朝廷到地方的治理系统出了严重问题,基层民众无法生存。在基层民众无法生存的状态下,文化传承也无法起引领作用。在明清600多年的稳定传统过程中,儒家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传承之所以能对社会秩序起重要的引领作用,主要的原因是文化传承塑造国民性,如习近平主席2019年3月4日下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习近平主席深刻地指出了文化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稳定传统,是因为儒家文化这个“魂”起了重要作用,而宗族在将儒家文化这个根与魂贯彻到基层国民起了重要作用。

明清两代,宗族对基层国民培了什么根?铸了什么魂?

一是孝悌。塑造族人“孝悌”是家族或宗族一切活动的核心。如修谱、祭祖是为了慎终追远、尊祖敬宗,这二者本是“孝悌”的表现,即宗族用“孝悌”来凝聚族人,反过来又塑造族人“孝悌”的本性。明清时期的族谱中族规、家训、祠规等,摆在首要位置的是“孝悌”,如《(宜春)古氏族谱·家训》:“正伦纪。百行孝悌为先,鞠育之恩与天罔极,徐行后长弟道宜然,况爱亲敬长源于天性,犯上作乱岂是故家?尔辈各宜协力自尽。至于族属尊卑原有定分,齿序难容,潜越毋论,五服之内即服尽情疏,名分犹存,交接之际须循理度,勿因小忿辄加凌犯,勿倚财力辄生褻慢,违者家法扑责,齐民穷究必严,读书明理者加等。”^①又《(萍乡小库村)王氏家乘》^②中《家范二十四则》对于该如何孝悌作了详细规定:

——族内子弟自年十五以上者,每岁新正必诣祖屋焚香,凡遇时祭及先人诞忌当敬谨奉祀,违者公斥不贷。

——子事父母以得亲顺亲为重,服劳奉养当竭其力,遇事禀命而行,疾病谨视汤药,即父母怒,我亦惟顺受而已。其事祖父母尤宜加谨焉,违者亲属须早教诫,倘教诫不悛,即应告知户族,重则禀官究治,轻则家规惩戒。

——子事继母固宜孝敬如事所生,倘有不敬,即以家规惩戒。其事庶母亦当一体奉养,恕可上慰亲心,免蹈不孝之罪,而为其母者不得故意刻薄,惟尊压逼或并不自珍重,如遇此等情节,亲属长者当秉公理处,以全天伦之爱,否则公同处罚。

——处兄弟宜式好无犹,兄固当友爱於弟,弟更宜恭敬於兄弟,怡怡一堂,天伦至乐,不然者偏听闺闾之言,致起阋墙之釁,一经鸣论即以家规惩戒。

——事长上宜谦卑逊顺,隅坐徐行,毋冒僭越。其事先生亦然,或有事故相触,必须退让,不得肆行无忌,违者毋论;有犯亲属,族属长者先责不敬之咎,后论其事之曲直。

上述“家范”对于如何敬祖、如何事长上、如何事父母、如何处兄弟等这些“孝悌”要求都作了明确说明。毫无疑问,族规、家范、家训等及宗族的活动对于塑造基层国民的“孝悌”本性有着重要作用。家族或宗族的有序,也就是一个小社会的有序,众多小社会的有序形成大社会的有序。

二是仁义、友善、和睦。仁义,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是有利于社会中人遵守社会秩序的思想理念,中国历代儒家文人、思想家和统治者都非常推重仁义,中国古代的经书与史书,其核心要义就是“仁义”二字,所以,仁义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核心,是学人品德与人格培养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学人,从受启蒙教育始,就在接受孝悌、仁义、礼等儒家核心思想的洗礼和人格塑造。宗族的乡绅们无论亲自授学还是办家塾与“延师课子”,或让子弟成为“邑庠生”,或到书院学习,他们都是在让子弟接受孝悌、仁义、礼等的塑造。宗族长者或乡绅们由于其本身是儒家文化塑造出来的文化人,他们同样以自己的孝悌、仁义、礼仪等人格作为典范,去潜移默化子弟、族人、乡人,在明清地方志和族谱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人物。

宗族的长者和乡绅们不仅以个人人格典范,还特别重视用族规来塑造族人的仁义、友善、和睦的品

① [清]古诚意修:《(宜春)古氏族谱》,清光绪二十三刊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7册。

② [清]佚名:《宜春小库村王氏家乘》,光绪二年三槐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1册。

格。如万载县清道光年间的《李氏族谱》^①卷一《李氏宗祠家规十条》中“崇忠义”条规定：“忠臣义士世所罕希，赤胆忠心毫发莫欺，光争日月，气贯虹霓，凛烈万古，为世表仪。”

在宗族的族规中，往往将友善、和睦具体化为“睦乡党”。如《（宜春）古氏族谱·家训》^②：“睦乡党。古者五族为党，五州为邻，睦姻任恤之教由来尚矣。顾乡党生齿日繁，比闾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减，凌竞以起，自必构成大怨，故乡党之中，必贵於和睦，古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缓急可恃者，莫如乡邻，务使一乡之中，父老子弟联为一体，安乐忧患，视同一家，农商相资，工贾相让，则里仁为美，比户可封，讼息人安，愿吾族凛遵勿失。’”道光年间的《（万载）李氏族谱》卷1《宗祠十》中的“和”条规定：“阴阳和而雨泽降，夫妇和而家道成，兄弟和而争论少，邻里和而是非平。”道光《袁氏族谱》卷首《家规十则》中的“和睦乡党”条规定：“乡邻与吾族接壤者，凡非吾渊娅即吾朋友，往来交际，固当喜相庆、患相恤、善相劝、过相规，即遇口角微嫌争斗，宜极力劝解，化大为小、为无，使之忿怒两消，亲逊和睦，方知仁里。”

在宗族的族规中，还往往将友善、和睦具体化为“息争讼”。江西是一个自宋代以来讼风就很盛的区域，直至清后期仍然如此，所以在一些宗族的族规中往往都对族人提出了不争讼的要求。《（宜春）古氏族谱·家训》中规定：“息争讼。争讼者因不平而起也，今人往往逞一时之小忿，操戈于大廷，不惟废时失业，亦且荡产破家，此大易有终离之戒。对人以无讼为贵也。愿吾族凡遇口角细故，须平心息气，投族房长理论，听其秉公处断，无伤宗族之雅，勿兴争讼，得饶且饶，若非深冤极仇，切勿哓哓公廷，戒之。”^③道光年间的《（万载）李氏族谱》卷一《合族十议》中的“息是非”条规定：“凡族间有不平之事，当投户族理论，自能决其低昂，分其是非，切不可大小男妇撒泼放赖，辄兴讼端，勿以些小致伤同族之谊。”^④

总之，宗族的教育和族规培植族人仁义、友善、和睦等的“根”与“魂”，毫无疑问，有利于基层国民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

三是勤劳、守法、端正。明清时期的族谱中的族规，都会有勤劳、守法、节俭和品行端正的明确要求，且作为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族人遵守。

如关于勤奋，《（宜春）古氏族谱·家训》：“勤职业。士农工商虽各别，皆有本职。勤则业修，懒则无成。古诗云：少年经岁月，不解早谋身。晚岁无成就，低头避故人。盖言蹉跎岁月，不勤生业，以致贫穷无藉也。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惟士而勤则博学多闻，义理充足，学不匮也。为农而勤，则禾黍丰熟，仓箱满余，家不匮也。”^⑤道光《（万载）袁氏族谱·家规十八则》：“人生在世莫过於勤，诚使男勤於耕，女勤於织，一生衣食自然丰足。然勤而不俭，所入不胜所出，一日之费，耗散终岁财。语云：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作有时。又云：量其所入，度其所出；能记此古语，则一生吃着不尽，各宜猛省。”^⑥这些族规对于为何要勤奋、要节俭，都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说明。

再如关于守法，首先要完国课，清代大多数族谱的族规中都有这项内容。光绪三十二年《（宜春）古氏族谱》中的《家规》：“我族子孙，凡於朝廷正供，每届征科，先期急公奉课，勿至吏扰追乎”，“此吾家规训首之以完国课，终之以息争讼。愿我族人拳膺弗失，共勉为纯良之民，而相安於保合大和之世矣。”在《家训》中又规定：“吾族管有钱粮者当早完国课，不可拖欠，谚云：若要安，先予官，斯外无追乎之扰，内无挂欠之忧，即啜粥饮水亦悠然自得矣！倘有意抗违，以致胥役剥啄叩门，多方需索，无名之费或反浮於应纳之数；试思供胥役之侵渔，曷若输朝廷之正供；为抗粮之顽户，曷若为守法之良民；愿吾子侄交相劝勉。”^⑦

① [清]李福祥修：《（万载）李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陇西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3册。

② [清]古诚意修：《（宜春）古氏族谱》，光绪二十三年刊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7册。

③ [清]古诚意修：《（宜春）古氏族谱》，光绪二十三年刊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7册。

④ [清]李福祥修：《（万载）李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陇西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3册。

⑤ [清]古诚意修：《（宜春）古氏族谱》，光绪二十三年刊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7册。

⑥ [清]袁国奉等纂修：《（万载东隅）袁氏族谱》，嘉庆十六汝南堂木活字本，存3册。

⑦ [清]李福祥修：《（万载）李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陇西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3册。

其次是不赌博,清代的族规、家训中,对赌博之害也往往会说明,并严禁赌博。《(宜春)古氏族谱·家训》中说:“严赌博。丧身辱先之事非一,其要莫甚於赌博。游惰之民不务生业,往往呼朋引类,斗牌掷骰,小则倾囊,大则荡产,以致饥寒交迫;初窃父母妻子衣食赏囊,继则穿穴逾墙,渐沦盗贼,或借开场撮头,以补输钱,卜昼卜夜,无外无内,遂尔貽羞中诟,是奸盗诈伪,未有不由赌博也。愿吾族中不时稽查,有犯者锁赴祠内究处,违者送官枷责。”^①

再如关于品行端正,孝悌、仁义、勤劳、守法这些都是品行端正之要义。在清代的族谱中往往会对妇女要守妇道作出明确的规定,即对于妇女的品行还会有特别的要求。如《(宜春)古氏族谱》中的《家规》:“明四德三从,故纺绩井臼,事姑哺儿,妇人常道”。对于“悍妒妇女咆哮翁姑,不顺夫男,离间骨肉,厚颜长舌,放泼尤赖,纵肆无忌,以致出乖露丑,深可痛恨,轻者家法昭然,重者七尺具在,夫男不阻间者,坐罪。”^②道光《(万载)袁氏族谱·家规十八则》载:“闺门乃万化之原,内外贵乎有别,妇人之职惟在主中,助夫益子而已。若厚颜长舌,波及妯娌,罪在夫主,甚至骄悍成性,不敬翁姑,不敬丈夫,七出难逃。”^③

明清时期正是儒家的文化传承培铸出中国国民孝悌、仁义、友善、和睦、勤劳、守法、端正等根与魂,无形中引领人们去遵守社会秩序,对社会较稳定地延续了600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对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起重要作用,因为儒家文化是产生于中国农耕社会环境的文化,是适应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和创造,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与魂。虽然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早已走出了农耕为主的生活,但无论中国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从今天来看儒家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糟粕,但不可否认,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仍然有许多思想理念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有益于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如前述的孝悌,除去其封建时代的糟粕,仍然是我们社会与家庭、家族所需的理念;而前述的仁义、友善、和睦、勤劳、守法、端正等人格要求,除去其封建时代的愚昧,同样仍然有利于当今社会发展。民族的根与魂,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需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但是“祖根”不会变,我们必须不断地在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培植好我们民族的根和铸牢民族的魂,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明清宗族的儒家文化传承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说明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必须按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④

[参 考 文 献]

- [1] 常建华.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J]. 安徽史学, 2010, (1).
- [2] 常建华.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J]. 安徽史学, 2009, (3).
- [3] 施由明. 明代江西农村宗族的大发展[J]. 中国农史, 2013, (2).
- [4] 施由明. 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J]. 农业考古, 2013, (1).

① [清]古诚意修:《(宜春)古氏族谱》,光绪二十三刊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7册。

② [清]古诚意修、古学杰纂:《(宜春)古氏族谱 家规》,光绪三十二年刊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7册。

③ [清]袁秀芝等纂修:《万载袁氏族谱》,道光二十一年汝南堂木活字本,江西图书馆藏,存5册。

④ 习近平主席的有关论述转见光明网“党建” http://dangjian.gmw.cn/2014-09/22/content_13330596_2.htm